

DIE YOUNG OWING TO DRINKING



殤

中国·长沙
湖南文艺出版社

酒

叶蔚林著
YE WEILIN



酒
殤
以
殤
酒
殤
酒
殤
酒
殤
酒
殤

叶蔚林著

酒殇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酒 殇

叶尉林 著

责任编辑：龚笃清

•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•

1987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9.5 插页：3 字数：196,000

印数：1——24,000

ISBN7—5404—0053—6 / I · 49

统一书号：10456·232 定价：2.50元

目 录

无竹的竹林村·····	(1)
酒 殇·····	(14)
美丽的野鸡坪·····	(34)
少年乔乔·····	(50)
蓝蓝的木兰溪·····	(57)
天鹅岭林涛·····	(82)
山里的女人·····	(99)
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·····	(105)
野闻四则·····	(201)
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·····	(208)
草 色·····	(240)
老脚和尼妹·····	(252)

无竹的竹林村

我们这批下放的文化人，叫做“扫地出门”。有两层意思：一层是说全家老小，坛坛罐罐一齐滚蛋，不留任何痕迹；二层是说，此一去，别再指望回到省城，回到自己从事多年的工作岗位上了。在下放“动员”会上，工宣队长讲过一通大道理，又历数过我们的“罪行”之后，宣布：我们这批人，到农村落户的第一年，工资、粮食照发，从第二年起，国家一概不管，完全和社员一样，靠工分吃饭。当时我心想：反正当农民，与其在湖南，何不回广东老家去？老家有三间老屋，有叔伯婶娘照应，好歹不至于饿死。于是麻起胆子找工宣队长，要求将我遣送回老家。工宣队长没听完我的话，一拍桌子训道：

“哼，你想回广东老家当农民是假。晓得你有海外关系，想逃跑是真！哼哼，警告你！你能跑到哪里去？跑到香港，我们断水！跑到外国，我们要解放全人类！跑到月亮高头，我们还有人造卫星！”

真是教人哭不是，笑也不是。

经过三天卡车的颠簸，我们终于到达菇母山区一个公社

所在地。等候再往下分，分到各大队。天色阴沉，彤云四合，细雨纷飞。山里的小北风慢慢吹来，钝刀子割肉似的，冷得难受。我们人多，扶老携幼，包裹行李庞杂，公社屋里搁不下。我们只好瑟缩在小街两边屋檐下。除了不懂事的孩子偶尔哭闹之外，大家默默不言，无可奈何地听从命运的安排。事情到了这般地步，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；但求分到一个比较富裕的大队，那就感谢上帝了。

在我们到来之前，为了接纳、安排我们，公社曾经专门召集各大队干部开过会。当时大队干部并无异议。干部下放劳动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是党中央的伟大战略措施，谁敢不拥护？再说，下放干部自带钱粮，并不增加生产队的负担，顶多腾间旧屋给他们住，舍瓢井水供他们吃就是。“欢迎，欢迎。”大队干部们说。可是现在情况变了，听说来人一年后就得赚工分，吃生产队的口粮，大队干部便吵嚷起来，表示不欢迎了。

公社会议室临街，窗子很大，里面吵些什么，街上听得一清二楚。大队干部们的话，有些说得很冲，很难听。我懂他们的土话，默默听着。想起从前两次来菇母山区，受到欢迎和优待的情景，恍如隔世；比比眼前，心里难过得很……吵嚷半天，公社革委会主任说了一通话，会议室终于安静下来了。又过了一会，大队干部们才陆续走出公社院子，来到街上。他们手里拿张小纸片，各自喊叫分配到本大队的人。喊应了，就认真地看看对方，勉强地笑笑说：“×同志，跟我来吧！”混乱一阵之后，大家都跟着“主人”走了，小街顿时安静下来。唯独没有人喊我的名字，唯独我这一家四口无人

认领。怎么回事呢，是不是名单写漏了？想问又不便问，也不知该找谁去问。一种被遗弃的感觉，使我惶恐不安。

等了一刻钟左右，从公社走出一个人，头戴黄军帽，肩上背支“三八”式步枪，四下望望，大步径直向我走来，很有把握地喊出我的姓名。

“是我。”我连忙答应。

他面对面打量我，麻脸上的一对小眼睛很亮，很尖利。又转头望望我的妻和两个小孩子，皱皱眉头，很直率地说：

“你们这一家，哪个大队都不肯要；我张麻子要啦！咱们要讲政策，你说是不是？”他不讲土话，打“官腔”。

他竟然问我是不是，我只能放松脸上的肌肉，笑一笑。

看见我笑，觉得不对头了，他马上沉下脸，严肃地说：“所以你到了队里，要老老实实，好好劳动，要好好表现自己……”

我点头称是。

他耸耸肩上的步枪，气派地挥挥手：“好啦，咱们走！”

按理他应当在前面领路，可是他不。他要我挑行李走前，妻带两个孩子走中间，他殿后。他时不时耸耸肩上的步枪，大声喊我：往左，右拐！这一来，路上的行人都驻足观望，以为我们这一家是被押解的犯人。

消息传开，被分配到其它大队的同志们都为我担忧过好些日子。不知道我又新犯了什么罪行，罪上加罪，落得这般特殊待遇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带枪是这个人的习惯和爱好。他出门必定带枪，上茅厕屙屎屙尿，也枪不离身。

他名叫张振武，是竹林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兼民兵营长。参加过抗美援朝，当过炊事班长。据说在上甘岭战役中，他曾经拿个炒勺当武器，活捉过两个美国鬼子，立过大功。复员回乡后，一直担任社队干部，掌握民兵武装。他私人带枪是经公社武装部特准的，因为他是打野猪的里手。打野猪用去多少子弹，他可以凭弹壳实报实销，随时补充。单凭这点，就足以证明：张振武是怎样受到上级的重视和信任了。他呢，也为此显得自尊、自信和自豪；开口闭口就是我张麻子如何如何。黑黑的麻脸经常保持一种非我莫属的严肃，透出洞察一切的神气。走路腰板挺直，步幅很大，两条胳膊甩起好高。

进了竹林村，张振武把我一家领到河边一间独立小屋。他不进门，站在门口向我发指示：以后凡事要向他请示报告，外出要向他请假。说完就走了。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，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限，他没到我的小屋来过。

我讨厌这个张振武，他那自以为是，盛气凌人的“强者”形象引我反感。然而我还是感激他；他不嫌弃我这一家，接纳下来，好歹让我们有了安身之所。

可是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观察，我知道张振武这个人并不坏。而且应当承认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张振武算是一个很好的农村基层干部了。他自尊、自信和自豪，是有根据的；因为他的确是个“强者”。他之所以强，并不完全出于他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，肩上时刻背支步枪。他体力强，意志强，品格正直。别看他瘦削，两百斤担子上肩不当一回事，扁担压成一张弓，大步流星，象刮过一阵小旋风。他插秧时，两

腿大叉开，管十二行，从左到右，从右到左，轻捷有如蜻蜓点水，跳荡有如弹奏钢琴。他不象别的大队干部那样指手划脚，游手好闲；他既说又干，边说边干。他白天劳动、开会、公差，夜里就一个人背上步枪，带条猎狗进山去打猎；经常通宵不睡，清早回村，照样下田劳动，一点不显出疲乏的样子。他仿佛有无穷无尽的精力。最难得的是，张振武还吃得起亏，处处以身作则，先公后私，先人后己。队里分什么东西，他总是借故走开，让社员们先选先拿，自己要最后的一份。上级指示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限定每户只准养五只家禽。社员们思想不通，开会没有结果。张振武把社员骂一顿之后，就回家里将自己的鸡鸭全抓出来，当众用斧一只只剁掉脑袋。任他老婆哭天抢地，他不管。张振武采取了行动，社员们不得不跟上。一天之内，竹林大队彻底割掉了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受到公社的表扬。

张振武不懂谦虚为何物。但凡做过什么事，他都要挂在嘴巴上，少不得自夸，自我标榜一番。他原来有六个儿子，我到竹林大队不久，他又有了第七个儿子。于是，他得意地对人说：

“我张麻子是‘神枪手’，炮炮开花！一连生七个儿子，谁有这个本事！”

社员们怕他，又不得不服从他。

张振武为了充分显示他的“强者”地位，对我监督特别严格。出工稍迟一步，他便不客气地当众批评，弄得我时时难堪。开头，我尽量避免和他接触，见他就躲开。但这样做的结果，却更引起他的注意，越发抓得紧。有一次，为了要

带孩子到县城看病，我到张振武家里去，向他请假。他沉着麻脸，不同意，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但是第二天中午，当大家在田里割麦子的时候，我又试着再次向张振武提出请假的要求。没想到，张振武立即就同意了，望望周围的社员，气派地挥一下手，大声说：

“好吧，我批准你三天假！”

为什么他昨夜不同意，现在又那么痛快地同意呢？想来也简单：因为昨夜是在他家里，没有旁人，现在是在众多社员面前。从此，我学乖了，但凡有什么要求，我决不个别和张振武说，专门在周围人最多的时候对他说，并且尽量做出谦恭的样子。这样，我所有的要求，一般都能达到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用适度的谦恭去满足张振武的自尊心和虚荣心，而我便得到实惠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竹林大队其实没有一根竹子，河边只有两棵老檀树，树干斑驳，树冠残缺；整个村子坐落在光秃秃的田埂上。社员们长年早出晚归，手足胼胝，从事艰苦的劳动。但他们的生活却惊人的贫困；一个劳动日只值八分钱，而且到年终还不一定能够兑现。家家户户常常过淡日子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。钱实在难得，一分钱硬币也被看成磨盘大。起先社员们只知道我月月十五号去公社领工资，但并不知道工资有好多。后来终于知道我每月工资九十元。九十元，我的天！立即成了爆炸性新闻，传遍全大队。我走出门，社员们便拿眼睛瞟我，三三两两，交头接耳：“他一个月赚九十元！”他们的目光里，交织着惊疑、羡慕、嫉妒，更多的成分却是尊崇和敬畏。一些青年社员跟我打哈哈：

“叶同志，六月日头好哩。有什么一时用不着的东西，翻出来晒晒，当心起霉哟！”

他们说的“东西”，是指钞票。

无形中我在队里的地位，起了微妙的变化。社员们开始主动来接近我，特别是老人和妇女。有事没事都喜欢到我的小屋来坐坐，和我的妻说芝麻，讲绿豆。我的两个孩子，头上长疖子，立即便有人采了草药送来。说是半边莲、七叶一枝花，捣烂调上米汤，一搽就好。社员们显然有意无意地向我讨好。讨好的意图是因为我有钱。果然过了不久，一个社员终于开口向我借钱，只借两角钱。两角钱算不了什么，但我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地位，不得不考虑后果。犹豫一阵，我还是把钱借给了那社员。我觉得，借钱借物，互通有无，互相帮助，本是生活中正常的事，说到哪里也不犯王法，我不怕。谁知有了初一，便有十五。一个人借开头，好些跟着来。他们需要的数目很小，三角、五角，至多不超过一元。在我经济条件允许范围内，我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。他们借到几角钱，那感恩不尽的样子，令我心酸。

我估计借钱的事迟早会让张振武知道，而且一定会引起他的反感和恼火。果不其然，一天下午，张振武突然敲钟，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。张振武站在一方凳上，耸动着肩上的步枪，开门见山，命令我站起来，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。我如实讲了借钱给社员的事，但不承认是什么罪行。我说，凡是向我借过钱的社员都可以作证：我没有拉拢、指使他們去毒杀耕牛，放火烧山，或者做过其它坏事。既然没有，所谓罪行就不能成立。社员们同情我，几乎异口同声说：

“莫造孽，人家叶同志做了好事呢！”

这一来，张振武认真发火了，麻脸铁青：

“你们的阶级立场跑到牛屁股去啦！他是什么人？三反分子，下放到咱们这里劳动改造的！他想凭几个臭钱，拉拢人心，腐蚀贫下中农，想向大队示威，想和我张麻子争夺领导权！办不到！贫下中农同志们，咱们人穷志不穷，穷得光荣、伟大、正确！宁肯饿死、病死，也不准借他的钱，听见没有？”说到这里，话锋一转，声音再提高八度，“他九十元算个卵！我张麻子打头野猪，随便卖个百把块，比他强！”

会后，张振武大概还向公社作过汇报。公社主任喊我去谈话，问明情况之后，倒没怎么难为我。嘱咐我以后不要再借钱给社员，影响不好。

从此，对来借钱的社员，我便一一婉言谢绝。借不到钱，社员们并不怪我，而是迁怒于张振武。他们议论说：“哼，人穷志不短，宁肯饿死、病死也不向别人借钱！他张麻子凭什么说硬话？还不是靠他一支步枪，打野猪杀肉卖钱！不然他一家九口喝西北风去！”

于是一些青年社员串联起来，到公社告状：张振武拿公家的枪和子弹打野猪，私人得利算不算搞资本主义？如果算，就应当缴他的枪；如果不算，大家也可以打野猪去。他会打，别人也会打；他有枪，别人有铳……公社开会研究过这事。由于公社武装部长坚持说不应缴张振武的枪，就搁置下来了。

张振武知道队里有人告他的状，火冒三丈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张麻子是复员军人，朝鲜战场立过功，你们比得么？老子打野猪，从来没误过集体工，为的是保卫生产，百分之

百的社会主义！”

好吧，既然打野猪是保卫生产，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，那么大家都来保卫生产吧！一股进山打猎的风从竹林大队刮起，迅速地蔓延全公社。这一年冬天掀起空前的狩猎高潮，连水库工地上的民工也乐于此道，出勤率直线下降。公社书记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，首先收缴了张振武的“三八”步枪，然后大张旗鼓刹住狩猎风。张振武表示坚决服从，将步枪擦了又擦，亲自送到公社去。

失去了步枪，张振武自然难过了几天，说话的声音都低了两个调。但他硬是振作起来了；磨利一把钩头柴刀，插在夹子里，时时吊在屁股后面。然而柴刀虽一时多少保持了他那强者的形象，但柴刀却打不到野猪。一个月之后，我发现张振武不再抽烟；工间休息时，大家坐下抽烟，他便快快地走开，不耐烦地东张西望。我知道烟瘾重的人，没烟抽是很难受的。我装作若无其事地靠拢他，友好地递给他一支香烟：

“张主任，这是新牌子，你试试味。”

张振武回过头来，狠狠瞪我一眼：

“纸烟我抽不惯！”

这年冬天，菇母山区严重冰冻。所有冬种作物，包括萝卜、白菜，全部失收。春节刚过，饥荒便露头。返销粮没钱买，救济粮迟迟拨不下来，竹林大队好些人家已经断了炊烟。张振武家里人口多，断炊最早。没烟抽可以，不吃飯可不行。真不知道张振武是怎么硬撑过来的；他依然坚持带头出工，依然挺直腰板走路。只是屁股后面再不吊把大柴刀，看来他不堪柴刀的重负了。一天，张振武领着大家挖冬田。挖着、

挖着，张振武就无声无息一头栽到土堡上：麻脸雪白，两腿凹陷，牙关紧闭，冷汗象泉水似的从额角渗出来。社员们吓慌了，七嘴八舌喊他，摇晃他，用力掐他的人中。看得出他不是病，是饿极虚脱。我急忙跑回村，拿来一点白糖，化水给他灌下去。一碗糖水入喉，他缓口气，悠悠地睁开眼。他摸到锄头，努力想站起，但做不到，双膝直哆嗦。他又重重地跌坐下去，狠狠地哼了一声，终于无可奈何地垂下头。

张振武两天没出门。第三天当我看见他时，着实吓了一跳。我从来不曾见到过一个人在四十八小时内，模样会变得那么彻底。他的变化不仅在于外表，主要还在于气质。如果说，原来他象一棵青竹，那么他现在就是一棵干竹。同样是竹子，区别却是多么巨大！他忽然咧嘴对我一笑。他从来没对我笑过，也从来没对别的人这样笑过。短暂的一笑中竟然含着谦和、抱愧、无地自容的意味。我友好地报之一笑，觉得他似乎对我有所求。但怎么可能呢，我又怀疑自己太敏感。

夜已经很深了，妻和孩子都已上床睡下。外面下着初春寒冷的细雨，整个村子陷入寂寞的黑暗中。我傍着油灯的昏黄在写信。忽然有人敲门。迟疑开门一看，万万没料到竟是张振武。他夤夜来访，不知有何要事，我忐忑不安。连忙将他让进屋，端凳请他坐，给他倒杯热茶。他不坐，双手捧住茶杯，挺挺身子对我说：

“有件事告诉你：上级早就来了通知：你们这些下放干部，都是犯了错误的同志……所以，原来讲的一年后不发工资，不作数了……工资永远照发，照吃国家粮！啊，就是这事……”

其实这事大家早就知道了，他说不说都一样。何况这也不是什么急事，何必漏夜通知！我猜想：他来可能还有别的事。果然，话说完了，他并不走，坐下来慢慢喝茶。他几次嘴唇蠕动，想说什么又不便启齿。他终于站起身来，轻轻将茶杯放到小桌上。

“好啦，就这事……我走啦！”他说。

“张主任好走！”我只好送他出门。

他一只脚踏出门坎，又缩回来，转身望着我，脸上露出极其勉强、痛苦的笑容：

“老叶，咱们是革命同志啦……所以我想……”他的麻脸胀得通红，喉结一动，将后半句话咽了回去。

“张主任，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就是。”

“老叶，别那么说……我是想向你借点钱……买点红薯丝，娃崽们实在……”他的声音颤抖了，说不下去。

“要多少？”我连忙说。

“十元钱，”马上又改口：“要不五元也行。”

我不再说什么，默默地将十元钱塞到他手心里。

“求你千祈别让社员们知道……”他紧紧攥住钞票说。

“张主任，你放心。”

“以后，我一定还你，一定！”

他向我深深一鞠躬，倒退出门，然后才转身匆匆忙忙走开。外面雨下大了，他没戴斗笠。

这一夜，我久久不能入睡。我想了很多：人穷不该志短，不该自卑，但人穷毕竟容易志短、自卑的。一个人是这样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恐怕也是这样。我感到悲哀……

将近一年过去了，张振武没有还给我十元钱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他是根本无力还我十元钱的。对于象张振武这样自尊心极强的人来说，欠下别人的债长久不能偿还，自然很痛苦不安。张振武不再督促我出工了，到什么地方去也不要我请假了。而且他还有意无意地尽量回避我，不跟我碰面。万一单独碰面了，他就胀红着麻脸低头走过去。我们之间的地位，彻底翻个边：从前我很怕他，如今他委实怕我了。我实在没有要他还我十元钱的意思，实在想把这事一古脑儿忘却。然而我愈表示坦然，他却愈是尴尬。于是相互间便有了一种恼人的“默契”，影子似的推不脱，抹不掉。

一直到我结束下放生活，离开竹林大队时，张振武也没能还我十元钱。送我上车那天，张振武选一担最重的行李挑上肩，一路默默无言，始终不敢抬头看我一眼。临开车时，我特意从车窗伸出手，向远远站在一旁的张振武招呼：

“张主任，再见！”

张振武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摇两下：“再见！”他说，麻脸羞愧得通红，小眼睛湿润了。

十几年过去，许多悲欢，许多人和事都已逐渐淡忘。唯独张振武这个人，以及他和我之间关系的变化，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为什么呢，也许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既浅显又深刻的哲理吧。

一九八二年秋天，我忽然收到一张十元的汇款单，汇款人是张振武。我惊讶，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我的地址。我从邮局取回来十元钱，珍重地夹进一本纪念册里。我感到安慰，抹去了一种该死的“默契”，如释重负。我闭上眼，张振

武那强者的形象便从我的脑海中走过。他依然腰板挺直，两条胳膊甩起好高；他不时耸耸右肩，那是因为他习惯于背步枪的缘故……

一九八五年七月

（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，疑似为《平凡的世界》中关于孙少平在煤矿生活的描写，因图像质量原因无法准确转录文字。）